

叙说的翻译史：鲁迅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译介叙事研究

马 鸣

(浙江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 要: 现有研究大都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解读为“革命文学论争”压力之下自我学习的手段, 或为“左翼”文艺运动引进理论指导。考察两部翻译史著述中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叙事, 可以从叙事时间、人物、方式、空间等角度对鲁迅翻译活动的起因作出新的解释: 首先, 虽然时间上与“左翼”文艺运动有重合, 但鲁迅的译介旨在向中国文学界客观介绍苏俄文艺领域的经验与成就, 延续了“五四”文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 其次, 鲁迅 1928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是其与 20 年代上海翻译资源互动的结果。由此, 可从叙事角度对现有翻译史书写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 史家应该在叙事中关注不同背景的译者, 对翻译事件提出更多元的解释; 其次, 史家应对译文进行文本分析, 进一步还原翻译过程; 再次, 史家应建构翻译事件发生时所处的社会空间, 揭示翻译活动复杂的社会起因。

关键词: 鲁迅;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左翼文艺理论; 翻译史; 叙事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5)04-0161-11

0 引言

1926 年至 1930 年间, 鲁迅译翻译了多部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作。Lennart Lundburg (1999: 112-135)、刘少勤 (2004: 116)、王友贵 (2005: 225-234, 239-242)、顾均 (2009: 142) 等学者曾考察过鲁迅这些译介活动的时间、内容、底本使用及译作的出版情况。这些讨论大多出现在对鲁迅翻译活动全景式的考察之中, 受篇幅所限, 研究者并未对鲁迅的译介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简单地将之视为鲁迅自我学习的手段。Benjamin Schwartz (2002: 138)、Leo Ou-fan Lee (2002: 202) 等学者在讨论鲁迅的思想、创作时零星谈及了其艺术理论译介的动机, 认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是在“革命文学”论争的压力下进行的。陈建华 (1998: 117-123)、孟昭毅、李载道 (2005: 172-176)、毛剑 (2006)、谭好哲 (1997: 421) 与汪介之 (2005: 57) 等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曾提及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 将其归为“左翼”文艺运动的成就加以梳理。

收稿日期: 2024-01-10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政治之外——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研究”(Y20153488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鸣, 男,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翻译史和叙事学研究。

引用格式: 马鸣. 叙说的翻译史: 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叙事研究[J]. 外国语文, 2025(4): 161-171.

如果出于学习目的,鲁迅阅读这些文艺理论著述就足够。若出于论战目的,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这些理论即可,没有必要将其译出。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等同于“左翼”文艺理论的引进,既对鲁迅与“左翼”的关系理解过于扁平(赵歌东:2012),也忽视非左翼文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动机。那么,鲁迅为何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译介活动与“革命文学”论争、“左翼”文艺运动有着怎样的联系?

翻译史是以翻译事件为主线的叙事文本。现有翻译史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动机的不同解读可以理解为史家的不同叙事。《中国文学翻译史》是一部全景式梳理中国近现代重要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译介的翻译史著作。《翻译家鲁迅》是一部专门讨论鲁迅翻译活动的翻译史著述。作为叙事文本,两部著述均叙述过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本研究从叙事时间、人物、方式和空间角度,分析两部著述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叙事,通过更为翔实的史料完善这一事件的叙事,对鲁迅翻译活动的起因进行更为丰富的解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叙事角度为现有翻译史书写提出建议。

1 被重构的叙事时间

在《翻译家鲁迅》的第十章“想象苏联:翻译苏俄文艺理论”中,史家以鲁迅的三本译著——《文艺政策》《文艺与批评》和《艺术论》为线索展开叙事。《文艺政策》的翻译时间——1928年5月被史家设定为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起点。在解释鲁迅的翻译动机时,就自然地与中国文坛同年爆发的大事“革命文学”论争建立起了因果关系。然而,史家的这一叙事时间与鲁迅翻译活动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1.1 作为叙事开端的《文艺政策》译介

1928年1月27日,鲁迅在上海内山书店购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与外村史郎共同编译的《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一书。通过阅读该书,鲁迅将中国的“革命文学”论争同1923年至1925年的苏俄文艺论战在理论方面建立起了联系。他于当年5月开始翻译该书,将译文发表在《奔流》期刊上。

1930年,水沫书店将这些散篇译文结集在《文艺政策》之中出版。在该书的“后记”中,鲁迅写道:“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鲁迅,1930:4-6)《苏俄的文艺政策》中收入了批判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的内容,鲁迅所谓“煮自己的肉”其实是反思或纠正自己文艺思想中受托洛茨基的影响。鲁迅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就曾阅读过托洛茨基的著作,甚至还翻译了其文艺理论著述,那才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开端。

1.2 现实的开端——《革命与文学》的译介

早在“十月革命”爆发时鲁迅就开始关注俄国,到了20年代中期,他将关注焦点集中到

了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他从1924年起购买了多部苏俄文学和艺术的著作,其中包括三部托洛茨基的作品。鲁迅非常看重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不仅两次购买,还于1926年翻译了该书的第三章。虽然鲁迅曾在自己的演讲和杂文中多次引用托洛茨基的观点,但他认为“革命文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会产生,这与托洛茨基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观点并不相同。可以看出,鲁迅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并非机械地接受某些文艺理论家的观点,他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批判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26年鲁迅翻译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从时间上看,显然与“革命文学”论争无关。《翻译家鲁迅》中,鲁迅的翻译活动被叙述为回应“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批评。为了配合这样的叙事,史家将叙事的起点设定为“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发生的《苏俄的文艺政策》译介,而鲁迅1926年《文学与革命》的译介则被史家少叙了。《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第十一章“现代翻译文学主将鲁迅”中,将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叙事时间设定在1928年至1936年,即“左翼”文艺运动期间。在第十五章“‘左联’及其翻译文学倾向与贡献”中,史家先是写道:“‘左联’的成立与翻译活动进一步密切了翻译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学的向前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研究。”(孟昭毅,李载道,2005:173)之后,史家就罗列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期间翻译的两部马克思主义文艺著述——《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著)与《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这两部译作的确是在“左联”成立之后出版的,但鲁迅早在1928年和1929年就已经译毕,作为“左联”的文艺成就叙述显然不妥。

在翻译史的写作过程中,史家由于自身的认识、职责,以及所在的历史环境,需处理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文学翻译史》是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沿用了传统文学史从政治角度叙述文学活动的框架。史家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叙事时间的重构,显然是为了与主流文学史对于鲁迅“左翼”身份的界定及“左翼”文艺运动意义的书写保持一致。

2 译介参与者隐身:叙事人物的选择

现有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叙事中,鲁迅为主要人物,几乎未提及其他人对于其翻译活动的影响。实际上,任国桢、冯雪峰、刘呐鸥、杜衡等文化人都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密切相关。

2.1 只被偶有提及的译介参与者——冯雪峰

《中国翻译文学史》在叙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时,只谈及了鲁迅与瞿秋白的成就。其实,冯雪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方面的成就,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译者。他自学日语后,通过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作了解到“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为发展与新社会相

适应的“新文艺”(冯雪峰,1927:2),他于1926年至1927年间翻译了《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文学的曙光期》及《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

1928年初,冯雪峰又翻译了《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他在该书的“序言”中直陈俄共布并未排斥“同路人”作家,并据此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站在鲁迅一边。冯雪峰此举意在运用俄国的经验解决中国文艺领域的实际问题,但也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较为机械。

虽然冯雪峰与鲁迅各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情况不同,但“革命文学”论争之后他们均认为中国知识界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及苏俄的文艺发展经验。1928年12月,柔石将已经翻译多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冯雪峰引荐给鲁迅。不久后,冯雪峰就邀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随即二人又共同发起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译介计划。丛书译介过程中,冯雪峰承担了译者邀请、联络出版、底本搜寻等工作,在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2 被隐身的译介参与者

任国桢是最早将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到中国的译者之一,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得到了他的启发和协助。1924年,任国桢开始翻译苏联文艺论战中各派的文章,将苏联文艺领域的经验介绍到中国。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出版。任国桢在北大读书期间与鲁迅相识,因此邀请鲁迅为该书校译。鲁迅完成校对工作后,还为该书写了“前记”,认为任国桢的译作让中国知识界了解了苏俄文艺的新发展。不久后,他本人就开始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革命文学”论争以后,鲁迅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1928年春,鲁迅邀请任国桢为其拟定一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目,作为译介活动的参考(蔡清富,2000:61-62)。鲁迅日后与冯雪峰发起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译介计划正是基于任国桢的所建议的书目。

冯雪峰与鲁迅二人决定发起“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冯雪峰邀请了刘呐鸥、戴望舒、杜衡(苏汶)、施蛰存、林伯修等人承担丛书分册的翻译工作^①,并将丛书的出版也交由刘呐鸥、施蛰存和戴望舒等人经营的水沫书店完成。刘呐鸥是丛书《艺术社会学》分册的译者。他不仅热衷于描绘现代都市颓废生活文学作品的创作与翻译,对无产阶级文艺也饶有兴趣。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述在当时日本文坛被称为“新兴文艺理论”,非常“时髦”。丛书的广告在宣传《艺术社会学》时,强调作者弗理契“否定了以前的艺术论”“创造

①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共17种作品被列入丛书的译介计划:(1)《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鲁迅译);(2)《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著,冯雪峰译);(3)《新艺术论》(波格达诺夫著,苏汶译);(4)《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卡斯基著,冯雪峰译);(5)《艺术与文学》(普列汉诺夫著,冯雪峰译);(6)《文艺与批评》(卢那卡斯基著,鲁迅译);(7)《文艺批评论》(列褚耐夫著,沈端先译);(8)《文学评论》(梅林格著,冯雪峰译);(9)《蒲力汗诺夫论》(亚柯弗列夫著,林伯修译);(10)《霍善斯坦因论》(卢那卡斯基著,鲁迅译);(11)《艺术与革命》(列宁、普列汉诺夫著,冯乃超译);(12)《社会的作家论》(伏洛夫斯基著,冯雪峰译);(13)《文艺政策》(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译,鲁迅译);(14)《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伊可维支著,戴望舒译);(15)《文学史论》(梅林格著,戴望舒译);(16)《艺术社会学》(弗理契著,刘呐鸥译);(17)《现代欧洲的艺术》(玛察著,冯雪峰译)。

了前人未到的新学说”(水沫书店编辑部,1930:底页)。弗里契推陈出新、标新立异的文艺观刚好符合刘呐鸥向中国文坛介绍“时髦”“尖端”内容的想法。

杜衡翻译丛书的《新艺术论》分册收入了波格丹诺夫的三篇演讲。杜衡的译介始于“革命文学”论争爆发之后,他对于波格丹诺夫的关注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革命文学”论争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艺理论之间的联系,其翻译动机很可能是追溯“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理论渊源。虽然杜衡的政治和文学活动表现出了“左”的倾向,甚至曾加入“左联”,但他后来与“左翼”文坛的对立,足以说明他不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杜衡的翻译活动多元且自由,翻译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题材、某一文学流派,抑或某一国家的作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其众多文艺兴趣中的一种。

与刘呐鸥、杜衡对于无产阶级文艺浅尝辄止的态度不同,丛书的另一位译者戴望舒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表现出激进的政治倾向,并加入“左联”。虽然他日后与“左翼”文学界渐行渐远,但其《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的译介显然与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有关。

综上,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涉及任国桢、冯雪峰、刘呐鸥、杜衡、戴望舒等多位文化人,但现有的翻译史叙事或多或少地割裂了这些文化人与鲁迅译介活动的联系。鉴于冯雪峰“左翼”的身份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家在叙述“左翼”文学成就时顺带提及冯雪峰。而同样参与了鲁迅翻译活动的刘呐鸥、杜衡、戴望舒等人则由于其“非左翼”的身份而在翻译史中长期隐身。现有翻译史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的叙事主要围绕鲁迅和瞿秋白展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叙述中被等同于“左翼”文艺理论。史家忽略了其他译者,尤其是“非左翼”译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因此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活动的叙事并不完整,对翻译活动起因的解释也并不全面。

3 未被采用的叙事方式:译本分析

译文记录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对于译本的分析有助于还原翻译过程,解释翻译活动的起因。现有翻译史中,史家的叙事方式几乎都未包括译本分析。本人搜集了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所用的日文底本,通过对比分析原文与译文,揭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情况。

3.1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属翻译方法——“硬译”

对比鲁迅这一时期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文及其对应的日文底本,可见他基本都采用逐字翻译的方法,即鲁迅自称的“硬译”。在《翻译家鲁迅》的叙事中,史家认为“硬译”凸显了强烈的世界意识,旨在介绍异质文化(王友贵,2005:172)。杉本良吉翻译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质量不高,译文表述不清之处颇多。日本文艺理论家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较少使用俄文原作,一般通过英文、德文、法文译本转译,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翻译质量。鲁迅曾表示,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底本的质量影响了他的理解与翻

译,对于有些无法理解的日文表达,他只能逐字翻译(鲁迅,1929a:4)。

另外,“译者的能力”有限也是导致鲁迅“硬译”的原因(鲁迅,1929a:9)。杉本良吉的译文中有许多古日语表达,虽然鲁迅曾经留日学习,但他在阅读杉本良吉的译文时还是遇到了重重困难。除了语言能力不足,鲁迅还曾坦言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薄弱,自己专业知识匮乏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文的质量(鲁迅,1929b:IV)。

综上,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使用“硬译”,与日文底本质量不高、个人语言能力和文艺理论修养有限有关。鲁迅的确倡导异化,主张采用直译输入异质文化,但“硬译”却是其在文艺理论译介过程中的无奈之举(马鸣:2014)。史家在叙事中,少有提及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方法与质量。这是因为鲁迅的译文可读性不高,既不利于构建鲁迅“现代翻译文学主将”的地位,也降低了“左翼”文艺成就的含金量。

3.2 “Ideologie”的译语选择与文学的社会功能

鲁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中存在大量专有名词,其中文译语并未固定。译者处理这些专有名词所使用的翻译方法能够反映出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成员在其鼓吹“革命文学”的文章里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华。他们夸大文艺社会功能的做法显然受到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影响。在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文章里,德语词“Ideologie”曾被翻译为“意识形态”“Ideologie”“意德沃罗基”等不同译语。“革命文学”倡导者们使用最为频繁的译语还是“意德沃罗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音译可以扩大文学的功能性,从而为“革命文学”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同人,1928:101)。与“革命文学”倡导者相比,鲁迅并不完全认同辛克莱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可以成为宣传的武器,能否完成宣传的角色还在于它能否坚持自身(鲁迅,1928:43)。鲁迅反对给文学强加过多社会功能,因此在《艺术论》《文艺政策》和《文艺与批评》的译文中,他并未采用“意德沃罗基”译语,而是将“Ideologie”译为“观念形态”。

“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还曾音译很多专有名词,以夸大文学的功能,如“普罗列塔利亚”“印贴利更追亚”和“布尔乔亚汜”等。鲁迅从未采用这些译语,而是将其译为“无产阶级”“知识阶级”及“资产阶级”。鲁迅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对于专有名词的不同翻译方法折射出他们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不同态度。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1928年至1930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复杂的接受状况。

历史的叙述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性,史家应完善历史叙事,使其不断接近真实。史家完善历史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丰富历史叙事方式。现有翻译史中,史家按照译作、翻译时间、译作内容梳理鲁迅的译事,再以其在一些文章或译作的序跋中表达的观点,解读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史家缺少对于译本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于译本重要性的忽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译本分析工作量巨大,对史家的精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

外,译本分析的基础是译文与原文的对比,由于历史久远,译本及底本的获取难度巨大。

4 被忽略的叙事空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南移至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聚集了大批南下的文化人,出现了多家大规模的外文书店,成立一批重点出版新文艺书籍的“新书店”,还涌现了一批热衷于新文艺书籍的读者。在这样的翻译空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在1928年至1930年间出现了一个高潮。

4.1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者在沪的聚集

20年代,多位从事马克思主义译介的译者来到上海,他们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甲午海战”失利后,中国知识界确定了从日本转贩西学的新模式。为了配合翻译日书,中国从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20年代,鲁迅、陈望道、沈端先和林伯修等留日学生回国后,来到上海从事文艺活动。冯乃超、刘呐鸥等从小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旅日归国华侨在这一时期也回到上海开拓自己的文艺事业。同时,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上海本地高校所培养的外语人才,如戴望舒、杜衡等也在沪从事文艺活动。这三类文化人从事的文艺活动均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

上海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还吸引了冯雪峰这样试图通过文艺活动推进中国革命形势的激进文艺青年。1927年10月,冯雪峰被北京军警通缉,在未名社躲避期间与时在北京的戴望舒和刘呐鸥结识。通过戴望舒介绍,冯雪峰于1928年初南下松江,至施蛰存家中避难。此间,冯雪峰与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的交往频繁,共同创办文学期刊。同时,在沪期间他与创造社和太阳社方面也有接触,且同冯乃超和林伯修逐渐熟悉。另外,冯雪峰与沈端先当时都在开明书店做事,交往颇多。因此,在与鲁迅发起“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冯雪峰邀请了这些译者加入翻译计划。

20年代,这些文化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上海,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动机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上海的聚集使得1928年至1930年间中国大规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活动的发生成为可能。

4.2 多家销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的外文书店

20年代末上海出现的多家大型外文书店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底本。上海的雁荡路、淮海路、虹口等地于20年代末出现了多家大规模的外文书店,它们与国外的大出版社建立了固定业务关系,在短时间内将美、英、法、日等国的畅销书籍引进到上海。这不仅为当时上海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知识获取渠道,也为他们的译介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底本资源。

王友贵(2005:172)就曾论及鲁迅刚到上海时的阅读兴趣,以及到内山书店购买日译马列书籍的情况,将鲁迅的译介活动与其阅读环境间建立起了联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活动主要是通过日文译本转译,译者们使用的底本大多购自位于虹口的内山书店。书店位于租界之内,国民政府无法干涉书店的经营,且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经营者内山完造对书店所售书目没有太多顾忌。四·一二政变后,上海的中文书店里很少销售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关的书籍,但却可以在内山书店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大都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20年代中后期,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和升曙梦曾赴苏联考察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情况,回国后便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受当时日本国内无产阶级运动影响,这些书籍十分畅销。随着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也有很大需求。于是,内山书店利用自身经营上的优势,将其引进到中国。

上海20年代末出现的多家大规模外文书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者最直接、最常见的底本获取渠道,这些外文书店所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者们从事翻译活动的必备资源。

4.3 专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出版的“新书店”

20年代中后期上海出现的一批“新书店”,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活动的密集出现。20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在上海出版界的垄断地位逐步形成,其精力主要集中在教科书的出版上,较少对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潮作出反应。到了20年代中后期,上海又出现了一批以光华书局为代表的纯粹出版新文艺书籍的“新书店”。书店经营者为了介绍新思想、新文艺,以一种相对激进的文化姿态去开拓大书店不愿触及的市场。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书店”投入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是当时公共租界一直没有颁布正式的出版法规,在其范围内开办书店的手续也很简单,管理比较宽松,甚至不需要特别登记。

1929年春,刘呐鸥、施蛰存、杜衡和戴望舒创办了水沫书店。几位经营者长期关注无产阶级文艺,十分推崇“新兴”文艺理论,部分经营者的政治倾向也曾经一度十分激进。冯雪峰与几人熟识。与鲁迅发起“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译介计划后,便将丛书的出版任务交给了水沫书店,1925年,沈松泉、张静庐和卢芳三人在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新书店”——光华书局。受蓬勃的革命形势以及创作社成员激进革命情绪的影响,书局的办刊方向一度左倾。另外,张静庐管理下的光华书局十分重视市场的变化。在得知水沫书店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光华书局随即找到鲁迅与冯雪峰,也希望策划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丛(施蛰存,1995:21)。光华书局与水沫书店的经营者比较熟悉,“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最终由水沫书店与光华书局共同出版。

对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来说,“新书店”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出版和传播平台,也是不可忽视的翻译资源。

4.4 热衷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的读者

20年代中期,上海的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大量西方文艺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文学理论在中国逐渐学科化。因为这一课程的广泛开设,文艺理论教材的需求也迅速增加。除了受学校文艺理论课程的影响,当时上海青年学生争相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著,更多则是出于对左翼进步文艺书籍的好奇。20年代末开始,国民党对进步书籍的查禁愈发严格。施蛰存(1996:840)曾回忆,一切文学刊物,“越是被禁止,青年人就越要千方百计找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著在这一时期已经被普通读者视为左翼进步书籍予以消费了。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之间的理论联系,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阅读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这些读者的消费行为引发了出版社与译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选题的关注,间接推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热潮。

综上,冯雪峰在“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策划过程中承担了拟定书目、邀请译者、搜集底本、联络出版者等任务,这其实是对当时上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资源的整合(马鸣,2021)。显然,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与上海当时独特的翻译空间密不可分,对建构上海当时这一特殊的文化空间尤为重要。但对于上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空间的建构需要文学、出版、教育等多个领域丰富的史料,因此史家的叙事并未涉及翻译空间。

5 结语

5.1 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复杂的社会起因

本研究搜集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本、日文底本,以及当时的文章、书账、信件、日记等一手史料,使用丰富的新史料完善了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叙事,对其翻译活动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解释。

第一,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旨在向中国文学界客观介绍苏俄文艺领域的经验与成就,可以视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文人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引进的延续。鲁迅的译介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的1926年就开始了。1928年鲁迅移居上海后,与冯雪峰共同发起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加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力度。虽然在时间上与“左翼”文学运动有所重合,但从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情况看,他对于文艺社会功能的认识与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有着明显的差别。20年代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文化人有很多,他们的文艺兴趣与政治背景各不相同,翻译动机也并非都是为“左翼”文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鲁迅1928年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是其与20年代上海特殊翻译空间内

的译者、读者、出版社、外文书店等资源互动的结果。鲁迅在沪期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受到了多位不同背景译者的启发与支持。“新书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选题的关注与上海青年读者对于文艺书籍的需求也推动了鲁迅的翻译活动。此外,上海内山书店销售的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是鲁迅翻译活动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活动的起因涉及众多因素,单纯从政治角度解释无法呈现起因的复杂性。

5.2 翻译史书写中的叙事问题及建议

本研究从叙事时间、人物、方式和空间考察了现有翻译史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叙事,发现史家的叙事策略仍存在可完善之处。

首先,现有翻译通史围绕某几位重要译者展开叙事,突出了其个人在翻译史上的地位,却遮蔽了其他译者对于翻译史发展的影响。史家在叙述中国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时,几乎都倾向于围绕鲁迅和瞿秋白展开叙事。史家的叙事策略显然是受到二人文学及政治地位的影响。与二人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者,即使成绩斐然,也在叙事中被一笔带过,甚至长期隐身。史家应该在叙事中关注不同背景的译者,呈现翻译史发展的更多侧面,对翻译事件提出更多元的解释。

其次,现有的翻译史叙事缺乏对于翻译过程的关注,并不完整。史家解读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动机时,主要依据其文艺兴趣、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政治环境,以及鲁迅在一些文章或译作序跋中提出的观点。译文是译者思维的记录,史家应对译文进行文本分析,进一步还原翻译过程,完善翻译史的叙事。

再次,现有翻译史的叙事缺乏对于翻译事件所处社会空间的建构。现有的叙事中,史家与传统文学史叙事基本保持一致,倾向于从政治角度解释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动机,忽视了当时上海的译者、读者、出版社、外文书店等翻译资源对鲁迅的影响。史家应建构翻译事件发生时所处的社会空间,揭示翻译活动复杂的社会起因。

参考文献:

- Lee, LeoOu-fan. 2002. Literary Trends: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27-1949[G]//Merle Goldma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ndburg, Lennart. 1999. *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1936*[M].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 Schwartz, Benjamin. 2002. 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y Forth and After[G]//Merle Goldma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陈建华. 1998. 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 上海:学林出版社.
- 蔡清富. 2000. 一篇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读楚图南《鲁迅和党的联系之片断》[J]. 鲁迅研究月刊(12):62-64.
- 冯雪峰. 1927. 序[M]//升曙梦. 新俄文学的曙光期. 冯雪峰,译. 上海:北新书局.

- 顾均. 2009. 鲁迅翻译研究[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刘少勤. 2004. 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鲁迅. 1928. 文艺与革命[J]. 语丝 V4(16):35-40.
- 鲁迅. 1929a. 译者附记[G]// 卢那察尔斯基. 文艺与批评. 鲁迅,译. 上海:水沫出版社.
- 鲁迅. 1929b. 小序[G]// 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论. 鲁迅,译. 上海:大江书铺.
- 鲁迅. 1928. 文艺与革命[J]. 语丝 V4(16):35-40.
- 鲁迅. 1930. 后记[G]// 外村史郎,藏原惟人. 文艺政策. 鲁迅,译. 上海:水沫书店.
- 马鸣. 2014. 再论鲁迅的“硬译”——从苏俄文艺理论《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说起[J]. 上海鲁迅研究(1): 217-229.
- 马鸣. 2021. 译介“马克思主义的 X 光线”:冯雪峰与“科学的艺术论丛书”[J]. 上海鲁迅研究(2):233-247.
- 毛剑. 2006.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与发展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
- 孟昭毅,李载道. 2005.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施蛰存. 1995. 沙上的足迹[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施蛰存. 1996.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谭好哲. 2011. 文艺与意识形态[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同人. 1928. 新辞源[J]. 文化批判(1):98-102.
- 汪介之. 2005. 回望与沉思:苏俄文论在 20 世纪中国文坛[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友贵. 2005. 翻译家鲁迅[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水沫书店编辑部. 1930.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M]. 伊可维支著,戴望舒,译. 上海:水沫书店.
- 赵歌东. 2012.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J]. 文史哲(1):140-154.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s of Lu Xun's Transl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MA Ming

Abstract: Researchers tend to interpret Lu Xun's transl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as his self-learn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the “Debate o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or importing theories for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By investigating the time, character, method and space of the narratives of Lu Xun's transl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in two translation history books, this article makes new explanations of Lu Xun's translation: firstly, Lu Xun attempts to introduce Russia and Soviet Union's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in art and literature to China, exten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by his translation, though the translations were done from 1928 to 1930 whe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took place; Secondl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s are the outcomes of his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resources in Shanghai in 1920s and 1930s. Based on the study, the article offers suggestions to the narrativ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writing: first, historians are expected to take translato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one translation event into the narrative to explain the even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econd, they are also expected to adopt translation text analysis in the narrative to better presen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rd, they are expected to build the narrative space to better reveal the reasons of a translation event.

Key words: Lu Xun;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leftist 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istory; narrative

责任编辑:李小青